

九州生氣恃風雷

——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與士人議政風潮的興起**

張 瑞 龍*

摘 要

嘉道間士林風氣的變化是清中葉歷史上頗受關注的現象，本文認為真正促成這種轉變的，是嘉慶十八年（1813）發生的震驚朝野的天理教事件。文章首先考察天理教事件消息在京師地區傳播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謠言，以及其給當時處於歷史未知之幕的人引發的恐慌。其次，從天理教事件的敏感性、朝廷詔諭的頻繁頒布、鄉會試的舉行以及軍隊的調動、關帝封號的變更等，考察事件消息在各地傳播的不同渠道及引起的持續關注。最後，討論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與反思，以及由此出現的士人議政之風對當下朝廷施政的議論和批評，進而朝廷法度成為反思和變革的對象。朝廷下詔求言等相關政令和兩次殿試策論有關天理教事件的反思和關注，使士人藉機發表反思天理教事件的激烈言論甚至抨擊朝政。它不僅表明清廷已無暇顧及鉗制士人思想言論的高壓政策，清代自雍乾以來的輿論環境與士林風氣亦由此發生關鍵性轉變。

關鍵詞：天理教事件、消息傳播、士林風氣、歷史記憶、清代

2012年5月20日收稿，2012年11月16日修訂完成，2013年5月2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講師。

** 本項研究得到中國人民大學 985 工程第三期專項經費的資助。論文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細緻精審的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一、引 言

與雍乾兩朝以文字獄高壓鉗制士人思想言論相比，嘉道間士林輿論風氣的變化，成爲清中葉歷史上頗受關注的現象。¹以往對這種轉變，或歸因於嘉道間「令人感覺不安」的政治局勢，或歸因於嘉慶帝「天資長厚」的個人性格。²近年的研究，則充分關注到和珅案與嘉慶親政以及洪亮吉案等政治事件的影響。雖然這種類似宮廷政變和牽涉面不廣的對某位士人的處置，對整個帝國士林輿論風氣轉變的影響程度，須進一步探討。³不過，這種從重大歷史事件來考察士林風氣轉變的思路，則給人以很大啓發。循此思路，我們發現真正促使整個帝國士林輿論風氣發生轉變的，是嘉慶十八年（1813）發生的震驚朝野的天理教事件。它不僅使清廷再也無暇顧及鉗制士人思想言論的高壓政策，也使後人形容道光朝中後期那種「處士橫議」、「議論蜂起」的言論氛圍在此時出現。⁴

-
- 1 相關研究，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617-630；楚金，〈道光學術〉、〈道光學術餘義〉，分別載《中和月刊》2.1(1941.1): 3-16、5.9(1944.9): 1-3，收在存粹學社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崇文書店，1971），頁 341-354、355-357；齊思和，〈魏源與晚清學風〉，原載《燕京學報》39(1950.12)，收入氏著，《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14-339；龔書鐸，〈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89-206；王聿均，〈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1982.7): 1-11；關愛和，〈清代嘉道之際學風士風的轉換與文學主潮〉，《中州學刊》1991.3: 96-100；嚴壽濤，〈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讀沈垚落帆樓文集〉，《中華文史論叢》第 7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52；魏泉，〈「宣南詩社」與嘉道之際的士風〉，載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49-73；羅檢秋，〈嘉道年間京師士人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292-317。
 - 2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31；孟森，《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66-367。
 - 3 朱維錚，《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141-172。
 - 4 金安清著，謝興堯點校，《水窗春曉》（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 80；孟森，《清史講義》，頁 367。

嘉慶十八年九月發生的七十餘名天理教教徒進攻紫禁城的天理教事件，在「農民戰爭」史的研究模式中，無論是變亂規模、組織綱領，還是「階級鬥爭」達到的層次，都無法與此前的川陝楚白蓮教變亂和此後的太平天國變亂相比。⁵但它在當時對帝國的震撼似不亞於前後那兩次變亂。這七十餘名天理教教徒的進攻皇宮之舉，導致整個北京城戒嚴，京城內、外大門關閉達六天之久。戒嚴期間，清軍大規模進駐京城，並對所有三品以下官員及軍民鋪戶等展開為時五天挨家逐戶的搜查。其時京城謠言四起，皇宮遭匪徒進攻的消息竟引起古北口駐軍的入京勤王之舉。在地方，距京兩千多里外的揚州，當局獲悉天理教事件發生後，竟欲實行全城戒嚴。天理教事件在當時引起的震撼於此可見一斑。

由於事件自身的特殊性及嘉慶帝為此特頒罪己詔之舉，加之在此過程中透露出的未來皇位繼承人等敏感信息，都促進了事件消息的傳播和朝野上下的密切關注。事件對士林的震撼，則是士人反思事件發生原因時，矛頭直指當下朝廷施政，士人議政之風再次出現。恰在此時，嘉慶帝又頒一系列詔書，號召各級官員反思事件的發生，此舉不但再次刺激了士人違反朝廷律法的妄議朝政之舉，更使其反思較少顧及朝廷禁忌，且將事件的發生歸咎於清廷鉗制士人思想言論的祖宗之法。清廷亦因應對統治危機之故，無暇顧及士人的思想言論，使鉗制力盡失。清代自雍乾以來的輿論環境與士林風氣由此發生轉變。

但學界對這一重大事件的消息傳播，除宋軍〈嘉慶「癸酉之變」後京畿地區流言淺析〉一文有所涉及外，尚無專門探討。⁶為使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及其對朝野的震撼有一直觀呈現，本文將首先按事件發生時序，逐日考察天理教事件發生後消息在京師地區的傳播與隨之產生的各種謠言和恐慌，以

5 相關研究，參見孟森，《清史講義》，頁 361-366；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馬西沙，《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李尚英，《紫禁城之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0）；李尚英，《清代政治與民間宗教》（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等。

6 宋軍，〈嘉慶「癸酉之變」後京畿地區流言淺析〉，《清史論叢》（1999年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292-310。

及京城秩序如何恢復。其次，考察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的傳播和引起的反應。最後，討論天理教事件對士林的震撼與士人如何因反思天理教事件突破朝廷禁忌，帝國的輿論環境與士林風氣亦因之發生轉變等。

二、天理教事件消息在京師地區的傳播及引起的恐慌

我們有幸查到天理教事件發生期間，北京的天氣情況。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的京城，據時在翰林院學習的庶吉士林則徐（1785-1850）記載，是個晴天。⁷震驚朝野的天理教事件（又稱「癸酉之變」或「禁門之變」），就發生在是日午刻。不過，當天知道這一消息的人並不多，且多是王公大臣和禁城內當值者。如在刑部供職的楊國楨（1782-1849），中午回家午飯，因「忽傳言東直門內有賊殺人，各旗兵丁持槍帶刀，紛紛赴東直門救援，便「不俟駕車，步行入署」。其時刑部漢堂官正「飛傳各司滿漢司員」，吩咐「各科房將平日各案繳存兇器查取備用……稍作準備，賊匪亦未必敢輕視也」。⁸禮親王昭槿（1776-1829）亦在邸「與僮手弈」，「聞變，騁馬入」。不過，據昭槿說，諸王大臣「亦有日落始至者，亦有逍遙雅步於御河岸者」，稱「以天潢貴胄之近，而漠然如越人之視，亦可謂無心肝人矣」。⁹這當然是一種解釋，但另一種情況則很可能是並未聞知事變消息。這天在家輪值送飯的內閣中書張大鏞（1770-1838），就與「逍遙雅步於御河岸者」極似，原因就是並未聽聞紫禁城之變。而且張氏於是日午後等僕人從署中送飯返回，才與友人駕車同往法源、棗花二寺賞菊，「徘徊瞻眺，逮日薄西崦，各分手散」。¹⁰

是日下午，諸王大臣招集將赴河南滑縣之變的火器營官兵千餘人，入紫禁城剿捕賊匪，並下命將京城內、外城門「俱行掩閉」。¹¹城門突然提前關

7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26；並參來新夏編，《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頁 72-74。

8 楊國楨，《楊國楨海梁氏自敘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7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 668。

9 昭槿，《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6「癸酉之變」條，頁 162。

10 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2 冊，頁 46。

11 昭槿，《嘯亭雜錄》，卷 6，頁 162；《林則徐集·日記》，頁 26。

閉、軍隊進駐皇宮，這些異常舉動無疑促成了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而是晚四更時分雷電交作，更驚醒了京城早已熟睡的人們。北方秋冬之季很少有雷電，對於當時尚迷信天變的人而言，此時已是深秋寒露節，現在忽然「雷大震」，更讓他們覺得天時有些「不正」。¹² 這也為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增添了些許神秘色彩。

十六日，天氣一改十三日以來的晴天，變得格外陰沉，而且颳起了風，給京城早在八月底就穿上厚棉衣的人們，更添了一分寒意。¹³ 黎明，張大鏞像往常一樣入署辦公，發現「正陽門半掩半啓，兵各掛刀箭，森立狀異」，行至外東華門，方從街兵那兒聽說紫禁城遭匪徒進攻之事：「老爺尚不知耶？昨夜宮中搜殺一夜矣！」當他「急步至內東華門」時，卻發現「門閉不得入」，「各官俱擠立門外，往來探問消息」。¹⁴ 讓人們恐慌的是，此時京城內、外大門都已關閉，皇帝尚在自熱河回鑾途中，宮中具體情形更不得而知。加上三天前從邸鈔上刊載的直隸長垣、河南滑縣、山東曹縣等地發生賊匪叛亂，直隸總督溫承惠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剿辦等消息，¹⁵ 更讓他們難以預料未來還會發生什麼不測之事：進攻皇宮的匪徒是否有同黨在外接應？滑縣、長垣等地賊匪會不會進攻京城？這些消息交織在一起，加上對未來發展的不可預測，更讓他們惶恐。

這種恐慌甚至在嘉慶帝君臣那兒亦有體現，是日辰刻，嘉慶帝接儀親王永璿等八百里急報，云十五日午刻賊匪自西華門進攻紫禁城，又接左翼總兵玉麟八百里急奏，言匪徒自東華門進攻紫禁城。¹⁶ 據說，嘉慶帝獲奏後與隨駕諸臣商量對策，當時諸臣中有「議欲奉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因軍機大臣董誥（1747-1818）奏言「是滋亂也，獻俘者且至矣」，御駕未行。¹⁷

12 《林則徐集·日記》，頁 26；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2 冊，頁 47。

13 《林則徐集·日記》，分見頁 25、26。

14 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2 冊，頁 46-47。

15 《林則徐集·日記》，頁 26。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 17 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影印本），頁 344；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嘉慶間武英殿刻本），卷 2，頁 1-4。

17 劉逢祿，〈記董文恭公遺事〉，錢儀吉纂，靳斯標點，《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

黃昏時，京城又忽有賊匪進犯西長安門的傳言，傳言甚至驚動了正在守衛皇宮的副都統慶祥和禮親王昭槿，據昭槿說，他們「鼓勵將士，命列隊以待，兵士有驚詫者，余欲正法，衆乃帖服」。其後，始知是古北口提督馬瑜率兵由密雲至京，「城北塵土蔽天，致有此訛傳也」。¹⁸ 然而，城外駐軍入京勤王的消息也由此散播開來，這更讓人們對京師局勢感到擔憂。與傳言同樣引起恐慌的，還有官兵的搜捕活動。是日，嘉慶帝諭令在京城內外展開全面搜捕。¹⁹

十七日，天氣仍然陰，颳風。京城內、外城門仍然關閉。與前一日相比，官兵在京城搜捕活動更為嚴密，變成挨戶搜查：「除婦女不查外，丁男按名點驗」，「如有外來行蹤詭秘之人隱匿在家，即行拿究」。原因是嘉慶帝以搜捕之事「非一、二日所能辦竣」，「恐草率從事，轉屬有名無實」，諭令各旗都統等「從容詳辦」。²⁰

中午，忽有消息稱帝自燕郊回鑾，「逾時遍禁城皆知之」，「貝勒綿志持鑰立東華門樓上佇望，景運門皆洞開，久之聲跡杳然」。晚間，又忽有謠言漫布京城，據昭槿稱，「禁城外喧嘩聲，俄時遍滿街巷，訛言太平湖（在城西南隅）業經接戰，又云西長安門已破」，「遍都城人聲沸騰」，「又有騎白馬人沿街傳呼有賊」，「至夜半，人聲漸息，實無一賊焚掠」。²¹ 奉嘉慶帝命回京督辦天理教之變的英和（1771-1840）亦言：「是夜，城中訛傳有賊自城北越牆而進者，有自城南越牆而進者，舉城驚駭，實無其事也。取令箭派官持往彈壓，毋許張惶，將傳信之步甲二人，插箭分翼遊街示衆，訛言始息。」²²

謠言雖然平息，但謠言引起的震動卻出人意料。駐守午門的副都統策凌，聞變竟「率兵開門首遁」；守衛皇宮的禮親王昭槿，亦「愀然變色」。民

1993），卷 38，頁 1093。又，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6「董文恭臨變鎮定」條（頁 421）；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 4「董曹兩相國遺事」條（頁 90）等對此均有記載，惟文字稍有異同。

18 昭槿，《嘯亭雜錄》，卷 6，頁 166。

19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影印本），卷 274「嘉慶十八年九月己卯」條，頁 720-721。

20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卷 274「嘉慶十八年九月庚辰」條，頁 724-725。

21 昭槿，《嘯亭雜錄》，卷 6，頁 166、167。

22 英和，《恩福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3 冊，頁 423。

間竟有聞變自殺，又有「全家殉節者」。²³ 這些雖屬極端之例，但其時京城人們極為惶恐的心情和承受力已達極限的心理，於此亦可見一斑。

十八日，天氣仍陰，颳風，氣溫驟降，竟有凍死人之事。²⁴ 京城內、外城門仍然關閉，官兵挨家逐戶的搜捕賊匪活動仍在進行，有關賊匪的謠言仍不時出現。時任四川道御史の辛從益（1759-1827）就因「人心惶惶，謠言蜂起」，「日夜巡查境內，不少休」，「或妄指某處藏逆匪若干，甚至數千」，便「處以靜鎮，單車往勘，立予取結銷釋」。²⁵ 這天，京城裏開始流傳一個消息：官兵在宋家莊抓獲一位名叫林清的賊犯，據說是主使賊匪進犯紫禁城的「盜首」。²⁶ 這或許使京城人們極度惶恐的心情稍有緩解。

十九日，連續陰了三天的天氣，終於放晴。上午辰刻，嘉慶帝自朝陽門乘馬「緩轡入宮」，在乾清門頒〈遇變罪己詔〉，並下令開啓內城門。今上回京，使京城已惶恐三天的人們，心裏稍感放鬆。不過，戒嚴仍未解除，外城門仍未開啓，官兵挨家逐戶的搜捕也仍在進行。²⁷ 不過，這時人們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到皇帝的罪己詔上，這可是歷朝以來為數不多的以「罪己」為名下的詔書。

二十日，晴。京城外大門雖仍未開啓，但官兵持續五天挨家逐戶搜查賊匪的活動終於停止。同時，在京城內駐紮五、六天之久的大批駐軍也陸續撤出。²⁸

二十一日，晴。晨，京師內外城各門遵前一日上諭「全開」，「照常以時啓閉」。²⁹ 是日，帝頒安民諭旨，並「刊刻謄黃，遍行曉諭」。³⁰ 留在京城內

23 昭槎，《嘯亭雜錄》，卷6，頁167、168。

24 昭槎，《嘯亭雜錄》，卷6，頁168；《林則徐集·日記》，頁26。

25 辛從益撰，辛桂雲等補輯，《辛筠穀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22冊，頁63-64。

26 《林則徐集·日記》，頁26。

27 昭槎，《嘯亭雜錄》，卷6，頁168；《林則徐集·日記》，頁2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17冊，頁348-350。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17冊，頁354-355；《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4「嘉慶十八年九月癸未」條，頁731。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17冊，頁355；《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4「嘉慶十八年九月癸未」條，頁731。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17冊，頁358-359；《清仁宗睿皇帝實錄》

駐紮的九百六十名護軍，也在這天撤回原營。持續六天的戒嚴終於解除，京城秩序總算恢復正常。雖然如此，但人們的心情似乎仍未從前幾天那種惶恐的狀態擺脫出來。時在京城裕泰（1788-1851）就稱人們「事平後猶各懷疑」。³¹ 十月二十一日，戶部主事郝懿行（1757-1825）致函阮元仍稱：「追思前日之變，猶為心悸」。³² 十二月二日，郝氏答友人信時提到天理教事件導致京師與地方信函往來被阻斷，云：「於時九門不啓，大索十日。行旅稀絕，走京者俱望國門而返……九月廿一日手書，於十一月十八日方行收到。」³³

京城天理教之亂雖然平息，但其時直隸長垣、開州、山東曹縣、定陶、河南濬縣、滑縣等地天理教之亂的軍事平叛還在進行中。這些地區均處帝國統治的中心地帶，一旦叛匪渡河南下突入江浙，或四出奔突流動作戰，勢必成為帝國的心腹大患。其後果更不堪設想，遠則導致「勝朝」敗亡的張獻忠、李自成流寇之亂；近則十年前剛剛平定的持續時間達八年之久的川、陝、楚等五省白蓮教之亂，都是「殷鑒不遠」的前車之鑒。這幾乎是當時朝野上下的共識，上至宗室昭槿、協辦大學士明亮，下至布衣學者管同等，均持此觀點。³⁴ 故滑縣等地的軍事平叛無時無刻不牽動整個帝國的神經，在京記名以御史的陶澍（1778-1839）有詩稱：「小丑潛逃日，眞愁蔓草如」，³⁵ 確實是當時人們心情的真實寫照。

此後山東曹州、定陶的叛亂於十月十二日平定，直隸開州、東明、長垣等地教亂也在十一月三日剿滅，煽亂三省的天理教之亂到十一月初便僅剩河

第 4 冊，卷 274「嘉慶十八年九月甲申」條，頁 732-733。

31 長善、長啓等，《東嚴府君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42 冊，頁 497。

32 郝懿行，〈奉答阮雲臺先生書〉，《曬書堂外集》（光緒十年《郝氏遺書》刻本），卷上，頁 19、20。

33 郝懿行，〈答學博林皋言先生書〉，《曬書堂外集》，卷上，頁 18。

34 昭槿云：「賊初起時，余告當事者，即憂其四出奔突，難以追逐，後聞其據城自守，已知其無能為。明參政亮初慮亦與余合，後知其計左，因謂余曰：『賊自趨滅亡，孤城致斃，此兵法所最忌者。此時雖命余呼賊為兄，亦所情願也。』余亦大笑。」（《嘯亭雜錄》，卷 6，頁 173）管同亦言：「曩令狂賊渡河而南，煽惑他省，攻無備之城，則易破而難守；處四達之地，則易竄而難防。」（管同，〈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因寄軒文初集》（光緒己卯重刻本），卷 6，頁 6）

35 陶澍，〈聞官軍破賊輝縣山中〉，《陶澍集（下）·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98），頁 457；王煥鏞，《陶文毅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6 冊，頁 127。

南滑縣一地。³⁶十二月初十日，被清兵圍困四十多天的滑縣縣城終於收復，不過據說這四十餘天仍「訛言四起，且復時駭聞」。³⁷可見，從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徒進攻紫禁城到十二月上旬天理教之亂全部平定的三個月間，天理教之亂無疑成爲帝國上下關注的焦點。

天理教之亂已平定，但京畿地區各種關於天理教的流言卻漸漸多了起來。儘管早在天理教事件發生後，京畿地區就有關於天理教的各種流言，而且清廷也採取相應措施加以控制和疏導，甚至參與編造流言藉以恢復朝廷尊嚴，維護政權存在的合理性和神聖性，挽回天理教事件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但嘉慶十九年二月，京畿地區關於「藥鈕扣」等藥物迷人的流言和引發的恐慌，還是引起清廷的追查。³⁸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人們持續關注天理教事件。

三、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的傳播與引起的反應

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迅速傳播並引起各方的關注，除消息自身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外，朝廷詔諭的頻繁頒布，例行鄉會試的舉行以及軍隊的調動、關帝封號的變更等，都是促成消息迅速傳播的重要渠道。且就消息傳播而言，事件自身的敏感性和特殊性，往往決定了其受關注的程度和傳播蔓延的範圍，而天理教事件恰是具備這些特徵的典型。

首先，天理教教徒進攻皇宮，這種在太平之世突發賊匪直犯宮闕之事，確實匪夷所思，嘉慶帝稱其爲「從來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在時人看來確不爲過。³⁹加之天理教事件發生後，京城戒嚴六天，附近駐軍入京勤王，戒嚴期間各種謠言不斷出現，都促成了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的傳播。《欽定平定教匪紀略》纂修諸臣言：「逆賊滋事之時，京外震驚，訛言易起」，確道出當

36 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 25，頁 36-45；並參馬西沙，《清代八卦教》，頁 271-290。

37 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 25，頁 45「纂修諸臣按語」。

38 參見宋軍，〈嘉慶「癸酉之變」後京畿地區流言淺析〉，《清史論叢》（1999 年號），頁 292-310。

39 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首，頁 19。

時實情。⁴⁰當天理教事件消息傳到揚州，當局竟以「林清不靖」，欲實行全城戒嚴，因二十八歲的汪喜孫（1786-1847）諫阻而罷。⁴¹

同樣在各地引起恐慌的，還有天理教教徒在河南滑縣等地的叛亂。據說開封等地，「民逃市逸，日色淒薄，所在死者枕藉，晝夜惟聞城堡角聲軒然」。⁴²消息傳到貴州，在遵義奉母的黎愷（1788-1842），聽聞傳言天理教徒已攻陷山東長山縣縣城，任知縣的父親及隨侍的兄長均遇難，於是「北望號痛，請於母，刻日戒途，赴山東之難」，及至長山，見「闔門故無恙」，方知「傳者妄也」。⁴³

其次，嘉慶帝處理天理教事件的特殊方式——頒〈遇變罪己詔〉，這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以「罪己」命名的詔書之一，承平之世更為罕見，可以想見自會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平情而論，嘉慶帝是位勤政之主，雖非雄才大略，但亦無明顯的失政、失德之處。在此情況下，嘉慶帝竟為天理教事件下詔罪己，引起的反響可想而知。時在廣州從化縣幕中授讀的姚瑩（1785-1852）便稱：「北來警信，大屬駭聞！何物妖民，敢猖獗至此！普天之下髮指心驚，乃聖主虛衷，詔先罪己。草野小臣，海隅伏讀，泣涕縱橫。」⁴⁴在泉州主講清源書院的陳壽祺（1771-1834）亦云：「今仁聖在上，未明求衣，日昃忘食，思艱圖易，加勞勩勤，遇變罪己，至於淚隨筆下，兢兢以因循怠玩之弊，風厲天下。」⁴⁵

最後，皇次子綿寧在天理教事件中「親執烏槍」，率先擊斃二賊，立下平叛首功，被封智親王。嘉慶帝在頒示天下的〈遇變罪己詔〉中特提此事，

40 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 15，頁 4。

41 汪喜孫，《汪荀叔自撰年譜》，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頁 1190。

42 鄭珍，《巢經巢文集》，卷 5，王鏊等點校，《鄭珍集·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頁 155。

43 曾國藩，〈遵義黎君墓誌銘〉，《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 341。

44 姚瑩，〈復座師趙分巡書〉，《東溟外集》（同治丁卯八月《中復堂全集》刻本），卷 2，頁 15；施立業，《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4），頁 63、68。

45 陳壽祺，〈與總督桐城汪尚書書〉，《左海文集》（三山陳氏家刻《左海全集》本），卷 5，頁 14。

且稱「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⁴⁶更讓人們對極為敏感的皇位繼承人問題多了幾分猜想和關注。正是基於這種原因，廣州地區流傳的天理教事件竟變成是皇位之爭的宮廷政變！十月二十一日（即原書 11 月 13 日，本文所引均轉為陰曆，以與其他史料時間保持一致），時在廣州的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在日記中稱：

在過去的三個月裡，在華北發生了叛亂，叛亂的結果使中國人大為焦慮不安……中國皇帝的弟弟利用此次災荒企圖篡位。他率領叛亂者佔領了皇宮兩天一夜，但遭清軍擊潰……（皇帝）對此次叛亂甚為惱怒，發布了好幾道上諭。他責備自己在道德上有缺點，譴責了政府的大臣們不負責任，缺乏愛國心和腐敗無能。他下令斬殺了 20 名太監，因其中有數人企圖用毒藥或其他手段謀害皇帝。⁴⁷

朝鮮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也不止於事件本身，亦包括事件透露出的未來皇位繼承人信息。十一月二十二日，天理教事件消息傳到朝鮮。⁴⁸次年閏二月，書狀官柳鼎養進呈朝鮮皇帝關於天理教事件詳情的「聞見別單」，也特別提到這位皇次子「酷似雍正帝」的時評及將來即位的可能，云：

皇次子綿寧，進封智親王，文武雙全，智勇俱備，中外屬望，以為酷似雍正帝云。⁴⁹

當然，天理教事件消息傳播的主要渠道，無疑是清廷為此頒布各種諭旨、詔書等傳播方式。且就可靠性而言，亦遠勝於民間的各種謠傳。一般而言，關於全國性事件的諭旨都會下達到省、道、府、州、縣等各級行政單位。⁵⁰天理教事件發生後，嘉慶帝九月十七日頒〈遇變罪己詔〉、二十日頒飭

4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 17 冊，頁 348；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 2，頁 27-29。

47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92-93。

48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編卷 13，《純宗實錄》，「純宗十三年十一月乙酉」條，頁 5085。

49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 13，頁 5086-5087。

50 參見昆岡等修，劉啓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第 8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光緒間石印本），卷 316「禮部·頒詔」，頁 84。

諸王大臣諭、二十四日頒〈酌減令節禮儀諭〉。⁵¹ 這些都是在全國頒行的諭旨，而天理教事件的確切消息傳到各地也通過這一渠道。

十月初五日，在杭州的浙江學政汪廷珍（1758-1828）就從諭旨中獲知天理教事件，稱：「本月初五日，浙江撫臣李奕疇接奉上諭一道，並頒到通諭詔旨一道行知到。臣驚悉逆匪七十餘人潛入禁城，持械逞兇……當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鴟張豕突之凶徒，實出意計之外。」⁵² 同月，在福州的福建巡撫張師誠（1762-1830）也接到京師發生天理教事件的諭旨：「十月，駭聞豫東逆匪林清，突犯禁城之變，奉到諭旨並欽頒〈遇變罪己詔〉一道。光天化日之下，乃有如斯梟獍，切齒驚心！」⁵³ 可能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到十月天理教事件的消息已在全國傳開。如時在長沙任湖南布政司理問的瞿中溶（1760-1842）稱：「十月，聞林清謀逆潛入京師犯闕。」⁵⁴ 而從淡水同知查崇華（1768-1841）處得知，這一消息也在這時傳到了臺灣：「癸酉十月，臺灣聞都中九月十五之事」。⁵⁵

嘉慶十八年為癸酉年，是清廷例行鄉試之年。⁵⁶ 順天鄉試以錄取名額多、較各省鄉試易中等原因，為各地士子豔羨。除順天籍考生外，其他各省貢、監生等有特殊資格的考生亦能參加。⁵⁷ 據查該科順天鄉試時間為八月初九至十六日，揭曉是九月初九日夜，九月初十日放榜。⁵⁸ 如此各省落第的貢監生離京至少要到九月初十日放榜後，加上九月十五日晚至二十一日晨京師戒嚴，京城外大門關閉，則十五日前尚未離京的各地貢監生定在京城親歷天理教事件。是年各省來京參加鄉試的貢監生總人數，尚未確知。不

51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卷 274，頁 722-723、730；卷 275，頁 742-743。

52 汪廷珍，〈欽奉詔諭殲除逆匪首夥恭請聖安摺〉，《實事求是齋遺稿》（道光間刻本），卷 1，頁 6。

53 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26 冊，頁 147-148。

54 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1 冊，頁 277。

55 包世臣，《藝舟雙楫》，卷 7 下，李星點校，《包世臣全集》本（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 473。

56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影印本），卷 9，頁 96。

57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頁 169。

58 《林則徐集·日記》，頁 26。

過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科順天鄉試，各省貢監生赴京應試者共千餘人，⁵⁹ 據此估算近四十年後的此次順天鄉試，各省貢監生來應試者當在千人以上。可以想像那些貢監生落榜後分回各省，向親友講述其在京城親歷的天理教事件，這又使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全國傳播。是年，二十二歲的龔自珍（1792-1841）就是該科順天鄉試的落榜者，龔氏落榜後南歸，寫有專門針對天理教事件的〈明良四論〉一組文章。考慮到此次鄉試的放榜時間，龔自珍很可能在京親歷天理教事件。⁶⁰

軍隊調動是促使天理教事件消息傳播的另一渠道。嘉慶帝在獲知天理教事件發生的九月十六日，即命陝甘總督那彥成馳驛兼程來京陛見，又命「江南提督烏爾卿額赴徐州邊界、安徽壽春鎮總兵官喀勒吉善赴穎、亳一帶，各帶兵駐守」。⁶¹ 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同興咨會兩江總督百齡「於江蘇、安徽兩省交界地方，分路協防」。百齡得訊後親自「選帶標兵馳赴徐州」，此後又奉諭「添調弁兵，相機剿辦」。⁶² 九月三十日，帝又命安徽巡撫胡克家「飭知署壽春鎮帶兵一千名，前赴交界處所分駐防守」，令其「督率地方文武各官，加意巡防，勿令賊匪一名闖入境內」。⁶³ 軍隊調動範圍除叛亂發生的直隸、河南、山東三省，還涉及了陝甘及江蘇、安徽等數省。

軍隊調動對時人有相當的影響。據青浦人諸聯（1765-?）稱，江南提督烏爾卿額領兵赴徐州邊界駐守時，「松人久不知兵，皆惶恐失魂魄」，有一吳

5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246。

60 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嘉慶十八年二十二歲」條，言龔氏「八月，應順天鄉試（未中），旋南歸。」（頁72）將龔氏離京南下，繫於八月。現在考知該科放榜時間，則龔氏離京必在此後，且若九月十五日前尚未離京，則極可能在京親歷天理教事件。龔自珍〈明良四論〉即針對天理教事件而發，關於這組文章的成文時間歷來多有爭論（參見楊天石，〈龔自珍的《明良》四論〉，《光明日報》「哲學副刊」，1962.1.12，後收入氏著，《哲人與文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41-45；顧國瑞，〈龔自珍《明良論》繫年新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9.1: 35-39），但此次鄉試放榜時間，似無人論及，故附述於此。

61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4「嘉慶十八年九月己卯」條，頁721。

62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5「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條，頁741-742。

63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5「嘉慶十八年九月癸巳」條，頁753。

姓人氏「軍籍有名，既啓行，半途逃竄」，被捕獲正法。⁶⁴十一月，鳳陽府教授倪模（1750-1825），以「鳳陽道府俱赴穎州堵禦河南逸匪」，率人在鳳陽城「晝夜巡警」。⁶⁵李兆洛（1769-1841）摯友許蔬園則因「安徽巡撫胡公克家屯兵太和」，「率鄉兵千人以從」。⁶⁶

天理教事件後，清廷為恢復朝廷尊嚴，凸顯政權的合理性與神聖性，編造「關帝顯聖」的神話，稱：「上年逆匪突入禁門時，恍惚之中，望見關帝神像，畏懼奔竄，立就殲擒。」又言清兵攻克滑縣時，賊匪於黑夜突圍，官兵不能準確施放槍箭，「忽城旁廟宇自行起火，照同白晝」，於是兩路夾擊，將賊匪悉數殄除，而此「自行起火」的廟宇就是關帝廟，且「廟雖焚毀，神像巋然獨存」。清廷以「此次逆匪滋事，屢荷關帝靈爽翊衛」，故於十九年二月議定在關帝封號「靈佑」之下加封御筆「仁勇」二字，稱其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關聖大帝」。⁶⁷關帝信仰是清代官方刻意推行的的重要信仰方式，全國縣級及以下行政單位都建有關帝廟，這一更改關帝封號的舉措無疑促進了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全國各地傳播。可以想像，這種全國性的祭祀和更改關帝封號匾額的活動，將促進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各地民間廣泛深入的傳播。

在消息傳播過程中，天理教事件也因個別地區的特殊情況，呈現地方特色。如廣州、澳門兩地因有西洋傳教士，長期以來清廷亦密切關注其是否有異動。因而該地流傳的天理教事件竟變成羅馬天主教神父們策劃、鼓動的叛亂！這一流言甚至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兩廣總督蔣攸銛（1766-1830）還為此專門派人到澳門密查此事。對此，馬禮遜在日記中做了詳細紀錄。十月二十一日（原書 11 月 13 日）記道：

有一個叛亂份子說他是信奉天主教的，說此次叛亂是由羅馬天主教的神父們策劃的，因此在廣州的中國總督相信此次叛亂可能是由羅馬天主教神父

64 諸聯，《明齋小識》（《筆記小說大觀》第 28 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影印上海進步書局本），卷 12「逃軍」條，頁 16。

65 江爾維，《倪迂存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18 冊，頁 124。

66 李兆洛，〈蔬園詩序〉，《養一齋文集》（光緒戊寅年夏重刊本），卷 2，頁 16。

67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卷 278「嘉慶十八年十一月己巳」條；卷 279「十一月甲申」條；卷 282「嘉慶十九年正月丙寅」條，分別見頁 794、807-808、850；宋軍，〈嘉慶「癸酉之變」後京畿地區流言淺析〉，《清史論叢》（1999 年號），頁 293-297、310。

們鼓動的，他便派遣下屬官員前往澳門進行秘密調查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主教和神父的行徑。這是一位在此調查的官員對我說的。⁶⁸

二十天後的十二月十一日（1814年1月2日）又記載稱：

今天有一位中國官員來，要我陪他去見一位葡萄牙官員，替他擔任翻譯，那中國官員對葡萄牙人說，中國總督懷疑在華北發生的叛亂，是由天主教徒所挑起的，所以要求盡可能地在澳門的葡萄牙人中作秘密的調查。

這種流言甚至到第二年春還在流傳，並有人深信不疑，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一日（4月11日）馬禮遜記載說：

今天接待了中國縣官來訪。他肯定華北叛亂的首領是一個天主教徒。⁶⁹

以上各種渠道促進了天理教事件消息在全國範圍廣泛而深入的傳播，而在一些特殊區域，天理教事件消息亦因之呈現地方特色。

四、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與反思

天理教事件對朝野各種群體的震撼，當以士人為最。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1. 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自覺關注和反思；2. 朝廷政令導致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3. 鄉會試造成的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與記載。三者互相關聯，關係亦錯綜複雜。

（一）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自覺關注與反思

由於天理教事件的特殊性，自然成為士人關注的重要問題。如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分巡何學林（1761-1817）自江寧監考江南鄉試回虞山署所，「俄聞河南邪匪事起，亟撤筵席，毀供張，辭賓客」，據盛大士（1771-1838）稱何氏「指壁上所懸輿地圖，示余曰：某縣失則某縣必不守，而鄰境受其害。為人臣子，平日所治何事，而貽患至此乎！感憤不安者累日。」⁷⁰盛大士亦有〈感事〉詩記其事，云：「野戍驚沙起，荒原落木秋。跳樑滋小丑，傳箭說中

68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頁93。

69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頁107、108。

70 盛大士，《蘊懷閣文集》（道光十二年《蘊懷閣詩文全集》刻本），卷4，頁13。

州。已悔先機失，難款上將憂。書生懷義憤，荷戟願同仇。」京城天理教事件的消息傳開後，盛大士又有「蟻賊窺畿輔，妖皇逼斗躔」、「宮闕倉皇日，天心默護持」、「義憤人齊奮，訛言勢絕危」、「十行罪已詔，涕泣爲蒼生」等詩句。⁷¹

消息傳到江寧，時任鍾山書院山長的八十三歲姚鼐（1731-1815）在給親友信中多次表達對時局的憂懼，其致函老友馬春田，一則云：「兗豫軍興，而江南已不免擾攘，不知數日來便得靖不？甚可愁慮也。」再則言：「東郡尚未有全靖的信，江南已有軍興之擾，杞憂亦何能免？」⁷² 致姪孫姚瑩函亦有「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坦」之語。⁷³ 而在給弟子的信中，姚鼐既有「時事紛紜，未知清了之早莫」的感歎，更有「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有痛自刻苦而已」的無奈。⁷⁴

在廣州的姚瑩從座師惠潮嘉道趙慎畛（1761-1825）處獲悉天理教事件後，即復函將其「平日有所竊憤，深憂於中者」，藉反思天理教事件「屢發其緒」，云：

因循寬縱，殷鑒在元。財盡兵驕，何以守國？潰癰之患已形，厝薪之勢彌急，而二三執政方且塗飾爲文，諱言國事。大體既昧，小節徒拘。忠志不存，空言掣肘。其當官有言責者，微文瑣屑，幾等彈蠅，更生之封事不聞，賈誼之痛哭安在？

在他看來，挽回官方這種疲弊習氣，在於得人才：「愚意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得人之法莫妙於因材善使，無以常格拘，無以小行責，白其志，伸其氣，寬其程，嚴其效。」而天理教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則是人心風俗之壞。對此，他感歎說：

嗟乎！正直敢言之氣於今衰也久矣，自古未有委靡若此之甚者也。古道亡而後人心壞，人心之壞，則自讒諂面諛始。諂諛成風，則以正言爲可怪，

71 盛大士，《蘊懷閣詩集》（道光元年刻本），卷 6，頁 4。

72 姚鼐，〈與馬雨耕〉，《惜抱先生尺牘補編》，卷 2，頁 15、16，《惜抱軒遺書三種》（光緒己卯春桐城徐氏刊本）。

73 姚鼐，〈與石甫姪孫〉，《惜抱先生尺牘》（咸豐五年聊城楊氏海源閣刻本），卷 8，頁 15。據信中「秋闈，吾家中甯遠之孫猶不爲寂寞」語，知此信作於嘉慶十八年。

74 姚鼐，〈與劉明東〉、〈與陳碩士〉，分別見《惜抱先生尺牘》，卷 4，頁 20；卷 7，頁 16。

始而驚，繼而憚，繼而厭，最後則非笑之，以爲不祥。夫以正言爲不祥，其時其事尚可問哉？⁷⁵

類似姚瑩這種對天理教事件的反思，還見於各地教亂未平定前，士人爲平叛的建言獻策。天理教事件發生後，在桐城丁母憂的軍機大臣方維甸(?-1815)奉旨奪情起復，署直隸總督。⁷⁶這一消息引起了江南士林的高度關注。梅曾亮(1786-1856)聞知，獻平叛方略，稱滑縣之賊，所以遷延數月未平，是因「方今官吏皆習故態，雖小利害至微輒袖手，委重律令，不一任勞怨爲天下先，此豪傑志士所以束手而無奇，奸人所樂窺而無憚者也」。提出「要在破崖岸，用望外之賞罰，一切以盡人才爲先，鼓衆心爲本」。認爲「誠如是，推之天下可也，況區區之寇！」⁷⁷梅氏的平叛之策，就是破格用人，而這一建策的背後則是對當下朝廷施政和吏治現狀的批評。

是年，梅曾亮又作〈民論〉，顯然也是針對天理教事件的反思，云：

天下有亂民，有姦民。毒官吏，迫饑寒，挺刀而卒起，索黨與隨和以自救，此亂民之常態也。若夫無所激發而倡爲狂悖之說，以招誘愚瞽而名之曰「教」，是爲姦民。……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間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奸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⁷⁸

認爲天理教之亂並非迫於飢寒的「亂民」，而是「倡爲狂悖之說」的「姦民」所爲，而這則是朝廷忽視對民衆的教化所致。

管同(1780-1831)亦有給方維甸的平叛獻策，認爲「復地剿賊，計不容緩」，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叛亂規模擴大。他說：「所慮者不在乎已興之寇，與州縣之已被賊殘者也。……觀賊近所處山東則曹、濟，河南則開、歸，江蘇則徐、邳，安徽則鳳、潁，此皆同所嘗遊，知其習俗大抵其人椎魯勁悍，輕死生而鮮畏刑法，……誠恐賊不速平，而此等因之以起，則雲合回

75 分見姚瑩，〈復座師趙分巡書〉，《東溟外集》，卷2，頁15-16。

76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33〈方維甸傳〉，頁2576-2577。

77 梅曾亮，〈上方尙書書〉，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1，頁19-20。

78 梅曾亮，〈民論〉，《柏枧山房詩文集》，卷1，頁2-5。

應之勢成，而事難卒辨矣。」故獻「堅壁清野」之策，認為「破賊之謀，固無踰於此策」。但「所可憂者，官貪庸而人心渙散，則此策不可成，而雲合回應之禍起，雖有管、樂亦難為已」。主張「惟人心固而後守備堅，守備堅而後賊勢敗」，建議方氏趁機整頓三省吏治，云：「公宜告三省長官，急講民事，利民者行之，害民者去之，其官吏之殃民者急罪而罷之，此事宜非公所得盡與！」⁷⁹

管同上書還分析了天理教之亂發生的原因，稱「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云：

國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長吏之於民不富不教，而聽其饑寒，使其冤抑，百姓之深知忠義者，蓋已鮮矣。天下幸無事，畏懦隱忍，無敢先動。一旦有變，則樂禍而或乘以起，而議者皆曰必無是事，彼無他，恐觸忌諱而已。天下以忌諱而釀成今日之禍，而猶為是言與！⁸⁰

認為是吏治問題和對民衆教化問題的忽視，導致此次叛亂，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則是士大夫們「恐觸忌諱」。故根本問題在於當時的士習、士風。是年十月管同又作〈重修甘敬侯墓碑記跋〉，藉論西晉清談抨擊此「恐觸忌諱」的疲敝士風，言：「後世士大夫無晉時清談之弊，顧平時則閉口恐觸忌諱，不幸小值寇警，有惶怖而莫知所出者矣，不知自視於晉人何如也？」這顯然是針對天理教事件而發。又言「將天下矜言高尚，敝則甚矣，猶逾於卑靡貪冒之為耶」，其意即當時士風連有亡國「惡諛」的清談都不如。文末云：「然則有國家者，非得賢才而蚤用之，固無以得夫急難仗義之臣與！」⁸¹即在隱諫清廷及早變革法度，鼓舞士風，以備他日不虞之需。

管同又有〈擬言風俗書〉，從國家法度方面探討天理教之亂，認為根本原因在於當時「好諛而嗜利」的風俗，而這種風俗的造成，則是清廷鑒於明代之弊而立的祖宗之法。他說「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但清代立法鑒於其弊而「一切矯之」，又造成了當今這種官常、士習之弊：「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懦，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

79 管同，〈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因寄軒文初集》，卷 6，頁 5-7。

80 管同，〈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因寄軒文初集》，卷 6，頁 5。

81 管同，〈重修甘敬侯墓碑記跋〉，《因寄軒文初集》，卷 3，頁 7-8。

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他認為借鑒前代立法的原則應是「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認為「明俗敝矣」，但「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才」，主張清除朝廷法度中有關士民言事的各種禁忌，以爵祿厚賞鼓勵士民上書言事，對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稱：「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慙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如此則「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為善」。⁸²言根本之策，在於變革朝廷法度。

龔自珍〈明良四論〉也是對天理教事件的反思。這組文章分別從士習士風、官員培養、升遷方式等方面系統討論當時社會政治弊病，認為士人、官吏的普遍貧困化，導致士人無恥、臣子無節；論資格、循資歷用人及官吏遷升方式，導致官場無生氣；主張重地方大吏及內外官員之權，趁「聖天子赫然有意千載一時之治」之機，改革更法。⁸³對龔自珍這些反思，段玉裁（1735-1815）評論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⁸⁴其後李銳（1768-1817）、王曇（1760-1817）也分別對〈明良論一〉、〈明良論三〉做過評論。⁸⁵可見對天理教事件的反思，已成為當時士林的重要話題。此後兩三年間，龔自珍又著〈乙丙之際箸議〉，主張清廷實行自改革，稱：「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⁸⁶這顯然也是對天理教事件進一步反思的結果。

士人對天理教事件關注的另一內容，是將天理教事件與星象天變等現象聯繫起來，這對那些平時素信天人感應的士人來說，自然是一大熱點。因嘉慶十六年秋有光芒丈餘（即尾巴長約十餘度）的彗星見於紫微垣，⁸⁷此在星

82 管同，〈擬言風俗書〉，《因寄軒文初集》，卷4，頁1-3。

83 龔自珍，〈明良論〉一至四，《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29-36。

84 段玉裁，〈龔自珍《明良論》評語〉，《龔自珍全集》，頁36。

85 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頁244。

86 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七〉，《龔自珍全集》，頁5-6。

87 相關觀測紀錄，參見北京天文臺主編，《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501-503。

占學上主兵象，可解釋成除舊布新之兆，又因紫微垣代表皇帝，彗星入紫微垣，表示對皇帝不利，所謂「彗孛紫微，天下易主」。⁸⁸ 在時人看來，天理教事件恰是此天變徵兆的應驗。十月二十一日郝懿行致函阮元，談及京師關於天理教事件天變徵兆的傳聞，稱：

賊既造滔天之惡，天亦顯未有之奇。鈞諭以爲天之愛帝，信不虛矣！戶部員外郎舒寧言，先是廣東白蓮教之妻子分給八旗爲奴，有葉氏婦者於十五日夜間，聞雷霆聲，啓太夫人曰：傳其此教，聞雷聲起，便當破賊。今得聞其應至矣。俄而林清擒逆黨，獲捷如回應。信知斯語非謬。而八月十三夜枉矢西流，占爲急變，應亦顯然。

又，前年夏，彗星見北斗，近紫微垣，天象昭明，帝心簡在。乃十月初三、初九等日，僉見太白熒惑二星迫近於月。⁸⁹

郝氏又有〈林清之變〉、〈記星〉二文記載天理教事件與當時天變的徵兆關係，表示「詳述於篇，並參稽於古，以著安不忘危之戒焉」。⁹⁰ 張大鏞也從這一角度記載天理教事件，云：

九月，京師有逆匪林清之警。是年彗星芒燭數十丈，直犯斗垣。每於臨臥時察其象，竊相疑慮。至九月十四日夜，飯後天光尚早，余偕沈葵岡夫子在庭中徐步閑談，忽光色如銀，照耀庭際，仰視有星自東南至西北而墜，其勢甚低，曳尾若帚，共相詫異者久之。……翼日，首逆林清就擒，星墜之象斯驗。⁹¹

馮右椿（1780-1842）亦言：「自辛未秋，彗星見，百日外，逾年有林清倡亂豫東，延及宮禁。」⁹² 其他時人如姚元之、姚瑩等也有類似記載。⁹³

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反思及有關平叛的建言獻策，其中多有對當

88 參見張瑞龍、黃一農，〈天理教起義與閏八月不祥之說析探〉，《歷史研究》2013.1: 84-99。

89 郝懿行，〈奉答阮雲臺先生書〉，《曬書堂外集》，卷上，頁 19-20。

90 郝懿行，《曬書堂筆錄》（光緒十年《郝氏遺書》刻本），卷 1 〈記星〉、〈林清之變〉，頁 5-6、12-13。

91 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2 冊，頁 46-47。

92 馮右椿，《客世行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6 冊，頁 683-684。

93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 7，頁 143；姚瑩，《識小錄》（同治丁卯《中復堂全集》刻本），卷 6 「星變」條，頁 13-14。

下朝廷施政的議論和批評。這些士人議政的水平和深度，已遠非嘉慶帝親政初，洪亮吉等建言根除和珅流毒、整飭官常士習以及主張治體尚嚴等施政手法層面的討論。⁹⁴ 而是深入到體制內部，檢討朝廷法度，甚至清廷鑒於明亡而立的祖宗之法，都在反思和批評之列，並建言朝廷及時變革國家法度，實行自改革，以免前代歷朝覆亡之禍。這些言論已遠遠溢出朝廷法度所允許的範圍，但竟未引起向來密切關注士林輿論動向的清廷的鉗制和打壓，則尤其值得探討。箇中原因，除朝廷此時正傾全力於平叛，無暇他顧外，亦與天理教事件後，清廷百般設法反省和檢討朝廷行政等各方面的問題，以根除邪教之亂的態度密切相關。

（二）朝廷政令與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

天理教事件發生後，嘉慶帝於回京次日下詔求言，云：「禍變之來，必有由致，不究其本，患將未已。諸王公大臣及各言官，如能洞見致患之源，官常吏治有亟須整飭修明者，各據所知，剴切直陳，朕必衷而行之。」⁹⁵ 在官方發起反思天理教事件之風。在仕學關係極為密切的傳統社會，官方的風吹草動自然會影響到士人。何況天理教事件本就是士人關注的熱門話題，而許多官員本身也是著名學者。故當官方反思天理教事件時，往往通過各種途徑徵求士人的意見，而士人也試圖通過這種途徑影響朝廷。

如時任御史的陳用光（1768-1835）有〈應詔言事摺子〉，被皇帝採納。⁹⁶ 從姚鼐致陳氏函中「慷慨建言，真有裨於國，此豈易言哉？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素發之，非他人所能助也」語，知其曾徵求過姚

94 洪亮吉，〈乞假將歸留別成親王極言時政啓〉，《卷施閣文甲集》續卷，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223-230。吳卓棣（Judith Whitbeck），〈從考證到經世：龔自珍以及十九世紀初中國士大夫志向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341-352。

9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17冊，頁353；《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4冊，卷274「嘉慶十八年九月癸未」條，頁730。

96 陳用光，〈應詔言事摺子〉，《太乙舟文集》（道光癸卯（1843）孝友堂重刊本），卷1，頁3-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18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372-373。

氏意見。⁹⁷可見官方反思與士人的密切聯繫。又，管同因風聞晉官郎中的好友朱桂楨（1767-1839）可能得御史之職，便致函朱氏，詢其「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並毛遂自薦說：「同向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顧不知其言果當否爾，今寄上，惟采擇焉。」⁹⁸嘉慶帝的下詔求言之舉，無疑促進了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和反思。

其次，天理教事件後，嘉慶帝頻繁下詔，且親撰詔諭，「兩月餘，先後發下御制文七篇」，並傳旨內廷諸臣「各抒所見，書以進御」。⁹⁹陶澍有詩云：「哀痛頻聞詔，安平合上書。」¹⁰⁰當是此事的寫照。這七篇針對天理教事件的御制文，分別是：硃筆〈遇變罪己詔〉、〈酌減令節禮儀諭〉、〈盡心竭力仰報天恩諭〉、〈報天恩肅吏治修武備諭〉、御制〈致變之源說〉、〈原教〉、〈行實政論〉。¹⁰¹帝且命將此刻板印刷（稱爲「墨刻」），不僅頒給「內廷諸臣」，還頒給各省督撫大吏，共八十人。¹⁰²十九年正月，福建巡撫張師誠就「奉到頒賜墨刻」，並「具摺陳謝」。¹⁰³當時朝中大員及各省封疆大吏，多有幕賓佐理翰墨章奏，或參與軍政事務。¹⁰⁴可以想見無論是內廷諸臣對這七份墨刻的「書以進御」，還是封疆大吏的「具摺陳謝」，都可能對這些遊幕之士有所影響，甚至或由他們捉刀代筆亦不無可能。這在無形中也促使這類士人關注和深入反思天理教事件。

（三）鄉會試與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和記載

97 姚鼐，〈與陳碩士〉，《惜抱先生尺牘》，卷 7，頁 16。

98 管同，〈與朱幹臣書〉，《因寄軒文初集》，卷 6，頁 11-12。又，幹臣爲朱桂楨之字，其生卒年據朱緒曾《莊恪集跋》（朱桂楨《莊恪集》卷末，收在朱緒曾編，《金陵朱氏家集》，道光庚子刊本）。

99 桂芳，〈《御制遇變罪己詔》恭跋〉，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影印光緒十二年思補樓重校本），卷 9〈治體三·政本上〉，頁 4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53〈覺羅桂芳傳〉，頁 11284。

100 陶澍，〈即事〉，《陶澍集（下）·詩文》，頁 457。

1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 17 冊，頁 348-349、353-354、368、380、396-397；《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卷 274，頁 722-723；卷 275，頁 742-743、747；卷 276，頁 758-759；卷 281，頁 840-843。

1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第 18 冊，頁 418-421。

103 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26 冊，頁 152-153。

104 尙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頁 38-40。

如前所述，天理教事件發生的嘉慶十八年癸酉是清廷例行鄉試之年，順天鄉試的放榜時間為九月初十日。此次順天鄉試的與試總人數雖不得知，但嘉慶九年甲子科（1804）和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1846）順天鄉試的與試總人數，分別是 8,900 餘人和 8,270 人。¹⁰⁵ 這兩科鄉試均距嘉慶十八年不遠，故由此推測此科順天鄉試的與試總人數應在八千人以上。由於天理教事件發生後的九月十五日傍晚到二十一日晨京師戒嚴，京城內、外大門關閉。如此鄉試得中者自然可能因準備明年春天的會試，留京或不急於離開京城而親歷天理教事件。落榜者則若未在放榜後五天內離開京城，亦因此後京師戒嚴而滯留京城，親歷天理教事件。

如果說癸酉鄉試使天理教事件對士人的直接影響，僅限於順天籍考生和各省應試的貢監生。那麼，次年舉行的甲戌科會試，則使天理教事件對士人的影響遍及全國各省的應試舉子。會試在次年三月初九至十六日舉行，由於這年多了一個閏二月，所以很多人可能未像往年那樣提前幾個月或半年來京。但由於天理教之亂發生的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帶，地屬中原，是南方幾省舉子赴京的路經之地。加之天理教之亂在地方的最後平定是十二月初十日的滑縣，且撤軍工作到次年春才完成。故儘管這些地區的叛亂都已平定，但對南方幾省赴京趕考的舉子仍有所影響。一是避開戰亂地區，防受侵擾；二是趁機到這些地區了解戰事經過。如徐保字（1786-1851）自歸安縣北上會試，就因「曹州餘匪甫平」，繞道而行，「就道山路」。¹⁰⁶ 盛大士則在赴京途中，特意路經兗州，「遇客從軍中來者，詳述山東、河南邪匪之亂」，且「援筆志其顛末」，並作〈豫東紀事詩六十二韻〉，以「俾陳風者有所采焉」。¹⁰⁷

清代各屆會試的與試總人數，據王德昭估算，約有七、八千人，如乾隆七年（1742）壬戌科會試，與試者共 5,993 人。¹⁰⁸ 不知是否因天理教叛亂

105 玉麟，〈順天鄉試錄後序〉，《嘉慶九年甲子科順天鄉試錄》（嘉慶九年刻本），頁 73；王東槐，〈丙午順天鄉試監試記〉，《王文直公遺書》（光緒辛巳年中秋月刊印本），卷 2，頁 12。

106 徐保字，〈阮鄰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9 冊，頁 151。

107 盛大士，〈豫東紀事詩六十二韻〉，《蘊懷閣詩集》，卷 6，頁 5-6。

108 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5；鄂爾泰，〈壬戌會試錄序〉，張廷玉等輯，《皇清文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 17，頁 10，總頁 676。

的影響，嘉慶十九年甲戌科會試，應試者僅四千餘人。¹⁰⁹ 可以想見，去秋發生而導致今上頒〈罪己詔〉的天理教事件，自然因其時事性、敏感性和特殊性，成為來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子的熱門話題。盛大士著天理教之變始末的《靖逆記》，就因其參加此次會試，「及至京，詢及林逆構亂，都人士言之甚詳」，而「綴錄所聞」，開始撰述。¹¹⁰ 而該科與天理教事件相關的殿試策論，更使天理教事件成為全國士人關注的熱點。其中一策稱：「《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固有之良，盡人同具，彼民習聞正論，則奇袤之說，自不得而中之。……正學興，則邪說熄，官常肅，則庶民從。」¹¹¹ 這顯然是針對天理教事件而提出的如何化民成俗、清除邪教等方面的問題。

不僅如此，殿試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一直持續到下科的二十二年丁丑科（1817）。該科殿試策論亦有直接針對天理教事件者，曰：

邪惡萌蘖之始，或結會斂錢，煽惑人心；或糾黨鬪狠，武斷鄉曲，地方官及時治之，本不難於立時淨盡。乃或畏其激變，姑息養奸，甚或聞之上司，而封疆大吏，反以多事斥之。一味姑容，縱邪害正，官既不經理，民甘心順從，以致受其害者，忍而不敢言，一旦煽動，為患甚大，非有司釀成之罪歟！保甲之制，所以弭患未萌，法至善也。……或謂民之不法，或迫於不得已，或陷於不自知。然則開衣食之原，而明禮義之方，固自有其本歟！若是者，典學以成化，迪知以用賢，澄敘以勵官常，糾詰以除民惡，保邦致治，莫要於是。¹¹²

這顯然是對天理教事件後朝廷為根除邪教採取的諸多措施的總結。以這樣的考題策試天下貢士，定其次第，所引發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可想而知。這大概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盛大士《靖逆記》初刻本問世後，當年即被多家（至少三家以上）書坊盜版、翻刻，成為當時熱賣書的重要原

109 章煦，〈嘉慶十九年甲戌科會試錄前序〉，《嘉慶十九年甲戌科會試錄》（嘉慶十九年刻本），卷首。

110 蘭稼外史，《靖逆記》（嘉慶庚辰春正道堂刻本），卷首。按：「蘭稼外史」為盛大士之號，見李濬之，《清畫家詩史》（民國庚午（1930）刻本），已上，頁 42。

11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第 18 冊，頁 615；《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4 冊，卷 289「嘉慶十九年四月壬午」條，頁 957。

112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第 5 冊，卷 329「嘉慶二十二年四月甲午」條，頁 337-338。

因。¹¹³

朝廷政令和殿試策論有關天理教事件的反思和關注，雖未直接導致朝廷禁止士人議政相關法律的解禁，但卻使士人藉機發表反思天理教事件的激烈言論甚至抨擊朝政。如管同將〈擬言風俗書〉寄給朱桂楨時，曾藉「以議俗之說責難於君，使聽者持子言而得禍則奈何」的設問疑懼，說：「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言得禍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當今天子仁恕恭儉，敬天愛民，……近者伏讀官箴，則已窺見九重勵精之意矣。」¹¹⁴可見朝廷政令對士人評議朝政的影響。士人議政之風，便在此夾縫中一度出現相當活躍的局面。

五、結語

以上我們首先從天理教事件發生期間，京城的天氣狀況著眼，逐日考察天理教事件發生後，消息在京師地區的傳播以及因之產生的各種謠言，及其給當時處於歷史未知之幕之人引發的恐慌。其次，從天理教事件的轟動效應，嘉慶帝爲此特頒罪己詔的特殊方式以及皇次子綿寧在禁城平叛中立首功晉封智親王，透露出的未來皇位繼承人的敏感信息等，考察天理教消息在各地迅速傳播及引起的各方關注。並通過朝廷詔諭的頻繁頒布，例行鄉會試的舉行以及軍隊的調動、朝廷對關帝封號的變更等，考察天理教事件消息傳播的不同渠道及其造成對事件的持續關注。尤其討論廣州和澳門等西洋傳教士活動地區，天理教事件消息因之呈現的地方特色——爲羅馬天主教神父所策劃，及由此引起地方當局的追查。

最後，討論士人對天理教事件的關注與反思，以及士人對當下朝廷施政的議論和批評，進而清廷鑒於明亡而立的朝廷法度成爲反思和變革對象。朝廷下詔求言等相關政令和兩次殿試策論有關天理教事件的反思，使士人議政在此夾縫中出現相當活躍的局面。清代自雍乾以來鉗制士人思想言論的高壓政策，經由嘉慶親政初處理洪亮吉案時引發士林輿論的強烈反彈，到此時已

113 辛德勇，〈盛大士《靖逆記》版本源流之判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2: 141-145。

114 管同，〈與朱幹臣書〉，《因寄軒文初集》，卷6，頁11-12。

無暇顧及，清中葉的輿論環境與士林風氣亦由此發生轉變。

其實，天理教事件之所以對朝野產生如此大的震撼，並引發士人評議朝政之風，另一重要原因是其引發的兩種歷史記憶：一是十年前剛剛結束的那場長達八年之久的川、陝、楚等五省白蓮教之亂，二是導致明亡的張獻忠、李自成流寇之亂。關於前者，做為皇帝的嘉慶帝有天理教之亂「較諸川陝教匪，似小而實大」的「御制」定論；做為學者的陸繼輅（1772-1834）則有「方川、楚奸民習教時，意在斂財而已，非有潛伏若斯之衆也，非有內應如劉得財、楊進忠其人也」的比較、評論。¹¹⁵ 對於後者，有從軍事平叛的戰略角度評論的布衣管同，稱：「昔明末張、李之亂，有論事者略如是謀（即堅壁清野之策），而當時不能用，領兵者與賊浪戰而已。」有追溯造成白蓮教、天理教之亂等宗教淵源的宗室昭槿：「近日陋偽，實皆起於明末之時。徐鴻儒數於山東燒香聚衆，稱白蓮教，沿至嘉慶初年，三省教匪弄兵九載。其後京師復有林清之變，皆其流毒。」¹¹⁶ 這兩種歷史記憶，使天理教事件在當時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事件本身的發展。故對於天理教事件的反思，也溢出其本身應有的範圍，廣泛涉及到政治、社會、學術、風俗、思想等各個領域，影響到清中葉歷史的各個面向。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做進一步探討。¹¹⁷

鴉片戰爭爆發前，四十八歲的龔自珍辭官離京南下，寫有一組〈己亥雜詩〉，其中一首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¹¹⁸ 可能是他覺得官常士習太過沉悶，需要一種新的刺激促其振作。鴉片戰爭來了，但真正驚醒國人的已是二十多年後的庚申之役（1860），英法聯軍侵入北京，咸豐帝棄都而逃。或許，他們忘了，數十年前這種刺激也曾有過，而且也因皇宮遭到攻擊而震撼朝野，其時年甫弱冠的龔自珍還著有〈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名作，建議朝廷實行自改革。不

115 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首，頁 15-16；陸繼輅，〈山東曹州知府吳君塔墓誌銘〉，錢儀吉纂，靳斯標點，《碑傳集》，卷 110，頁 3175。

116 管同，〈上方制軍論平賊事宜書〉，《因寄軒文初集》，卷 6，頁 7；昭槿，《嘯亭續錄》，卷 5，頁 512。

117 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嘉道之際學術轉向」（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頁 41-112、139-236。

118 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頁 521。

同的是，此時的攻擊者已非清帝統治下的「亂臣賊子」，而是來自技術、制度、文化等各方面都不亞於中國的「化外夷人」。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張廷玉等輯，《皇清文穎》，《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托津等纂，《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嘉慶間武英殿刻本。
- 清·蘭穆外史，《靖逆記》，嘉慶庚辰春正道堂刻本。
- 清·錢儀吉纂，靳斯標點，《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長善、長啓等，《東嚴府君年譜》，北京圖書館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4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 清·馮右椿，《客世行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6冊。
- 清·江爾維，《倪迂存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18冊。
- 清·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1冊。
- 清·汪喜孫，《汪荀叔自撰年譜》，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
- 清·辛從益撰，辛桂雲等補輯，《辛筠穀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22冊。
- 清·徐保字，《阮鄰自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9冊。
- 清·楊國楨，《楊國楨海梁氏自敘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7冊。
- 清·英和，《恩福堂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3冊。
- 清·張大鏞，《鹿樵自敘年譜稿》，《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32冊。
- 清·張師誠，《一西自記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26冊。
- 清·昭槿，《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清·姚鼐，《惜抱先生尺牘》，咸豐五年聊城楊氏海源閣刻本。
- 清·姚鼐，《惜抱先生尺牘補編》，《惜抱軒遺書三種》，光緒己卯春桐城徐氏刊本。
-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姚瑩，《東溟外集》，同治丁卯八月《中復堂全集》刻本。
- 清·姚瑩，《識小錄》，同治丁卯《中復堂全集》刻本。
- 清·諸聯，《明齋小識》，《筆記小說大觀》第28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3，影印上海進步書局本。

-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金安清著，謝興堯點校，《水窗春嚶》，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洪亮吉著，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清·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光緒戊寅年夏重刊本。
- 清·汪廷珍，《實事求是齋遺稿》，道光間刻本。
-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李星點校，《包世臣全集》本，合肥：黃山書社，1993。
- 清·陳壽祺，《左海文集》，三山陳氏家刻《左海全集》本。
- 清·郝懿行，《曬書堂筆錄》，光緒十年《郝氏遺書》刻本。
- 清·郝懿行，《曬書堂外集》，光緒十年《郝氏遺書》刻本。
- 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道光癸卯（1843）孝友堂重刊本。
- 清·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清·管同，《因寄軒文初集》，光緒己卯重刻本。
- 清·梅曾亮著，彭國忠、胡曉明校點，《柏棧山房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清·盛大士，《蘊縻閣詩集》，道光元年刻本。
- 清·盛大士，《蘊縻閣文集》，道光十二年《蘊縻閣詩文全集》刻本。
- 清·陶澍，《陶澍集》，長沙：嶽麓書社，1998。
- 清·王東槐，《王文直公遺書》，光緒辛巳年中秋月刊印本。
- 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影印光緒十二年思補樓重校本。
- 清·朱桂楨，《莊恪集》，收在朱緒曾編，《金陵朱氏家集》，道光庚子刊本。
-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詩文》，長沙：嶽麓書社，1986。
- 清·鄭珍著，王鐸等點校，《鄭珍集·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 清·昆岡等修，劉啓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續修四庫全書》第 8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影印光緒間石印本。
- （英）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影印

本。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影印本。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影印本。

《嘉慶九年甲子科順天鄉試錄》，嘉慶九年刻本。

《嘉慶十九年甲戌科會試錄》，嘉慶十九年刻本。

李濬之，《清畫家詩史》，民國庚午（1930）刻本。

王煥鏞，《陶文毅公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6 冊。

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組、研究室編，《林則徐集·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吳晗編，《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二、近人論著

王聿均 1982 〈清代中葉士大夫之憂患意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1 (1982.7): 1-11。

王德昭 1984 《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北京天文臺主編 1988 《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總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朱維錚 1995 《音調未定的傳統》，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李尚英 2002 《清代政治與民間宗教》，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

李尚英 1990 《紫禁城之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辛德勇 2006 〈盛大士《靖逆記》版本源流之判別〉，《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2: 141-145。

宋 軍 2001 〈嘉慶「癸酉之變」後京畿地區流言淺析〉，《清史論叢》1999 年號，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292-310。

來新夏編 1997 《林則徐年譜新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孟 森 2006 《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

尚小明 1999 《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施立業 2004 《姚瑩年譜》，合肥：黃山書社。

馬西沙 1989 《清代八卦教》，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梁啓超 1996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 1991 《中國紳士——關於其在 19 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張瑞龍 2008 「天理教事件與嘉道之際學術轉向」，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張瑞龍、黃一農 2013 〈天理教起義與閏八月不祥之說析探〉，《歷史研究》2013.1: 84-99。
- 楊天石 1962 〈龔自珍的《明良》四論〉，《光明日報》「哲學副刊」，1962.1.12，後收入氏著（2007）《哲人與文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 41-45。
- 楚 金 1941、1944 〈道光學術〉、〈道光學術餘義〉，分別載《中和月刊》2.1 (1941.1): 3-16、5.9 (1944.9): 1-3，收入存粹學社編（197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香港：崇文書店，頁 341-354、355-357。
- 齊思和 1950 〈魏源與晚清學風〉，原載《燕京學報》39 (1950.12)，收入氏著（1981）《中國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頁 314-339。
- 樊克政 2004 《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 錢 穆 1997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魏 泉 2005 〈「宜南詩社」與嘉道之際的士風〉，載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49-73。
- 羅檢秋 2005 〈嘉道年間京師士人修禊雅集與經世意識的覺醒〉，鄭大華、鄒小站主編，《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92-317。
- 關愛和 1991 〈清代嘉道之際學風士風的轉換與文學主潮〉，《中州學刊》1991.3: 96-100。
- 嚴壽澂 2003 〈道光朝士風與學術轉向——讀沈垚落帆樓文集〉，《中華文史論叢》第 7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52。
- 顧國瑞 1999 〈龔自珍《明良論》繫年新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1999.1: 35-39。
- 龔書鐸 1981 〈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89-206。
- Naquin, Susan. 1976.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hitbeck, Judith (吳卓棣) 1984 〈從考證到經世：龔自珍以及十九世紀初中國士大夫志向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341-352。

The Spread of News of the Tianli Sect Incident and the Rise of Discussion of Political Affairs among the Literati

Zhang Ruilong*

Abstract

The change in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reigns of the Jiaqing 嘉慶 and Daoguang 道光 emperors in the mid-Qing is a phenomenon which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scholarly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rue impetus for this change was the Tianli 天理 Sect Incident of 1813, which sent shockwaves through the imperial court. The author first investigates the spread of the news of the incident around the capital, the various rumors that followed, and the fear felt by people as yet unaware of the complete picture. Secondly, by investigating the sensitive nature of this incident, the frequency of imperial edicts promulgated by the court, the holding of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s and transfers of troops, the alteration of titles given to Guan Di 關帝 and so forth,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different channels by which the news was disseminated in each region and the lasting interest this attracted. In the final section,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ncerns and reflections of the literati regarding the incident,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a trend for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riticism of court policy, which led to the i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themselves becoming the targets of reflection and reform. Related decrees issued by the court

* Zhang Ruilong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History at th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urging scholarly discussion and two final imperial examination essay questions about the incident were taken by the literati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radical opinions, and even attack court policy. This not only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Qing court had no time for implementing high-handed policies suppressing scholarly discourse and expression, but also that a key shift had occurred in public opinion and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since the reigns of the Yongzheng 雍正 and Qianlong 乾隆 emperors.

Keywords: Tianli 天理 Sect Incident, spread of the news,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historical memories, Qing dynasty